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 清华路径^{*}

张 锋◎

【内容提要】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是由阎学通教授组织的清华大学研究团队的重要成果，代表着国际关系领域清华研究路径的兴起。这一研究取向的特征是应用一种特定的科学方法，分析借鉴中国先秦思想，以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并为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本土化的代表作，该书会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作为中国学界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贡献，它具有不俗的理论潜力和政策意义。虽然清华路径尚需多方面努力以获得学界的认可乃至形成一个“清华学派”，但它无疑提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雏形与框架。

【关键词】 清华研究路径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中国学派 先秦思想
中国崛起



际关系学不是中国本土源流的学术领域。符合现代学术标准的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恐怕不足 30

* 本文提到的清华路径第一阶段的研究在作者任教清华大学之前已经完成，因此作者并未参与其中，本文也是从一般学术评价的角度出发写作。感谢许田波（Victoria Hui）和匿名评审专家提供的修改意见。文中不当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12/4（总第32期），第125—156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年。在这一短暂的历史中,引进西方学术是主流,“出口”中国学术大概只是一种奢望。正因如此,2011年西方世界国际关系领域顶尖出版社之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学者文集《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这可被视为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进入一个转折点的重要标志。西方出版中国学者的著作自然早有先例,但多数是在像历史或哲学这样有强大中国本土底蕴的领域。^①此次由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撰写的关于中国先秦国际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文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②

此文目的是将该书置于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中,浅论其学术贡献与不足之处,并指出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及中国崛起这一实际政策问题的意义。文章首先指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这一研究取向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以及它对近年来所谓“中国学派”争论的意义。正文主要讨论该书的研究方法问题、理论前景及政策意义。二十多年来,阎学通教授一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政策、方法和理论的杰出开拓者之一,此书是其学术成就的充分展现。本文是对清华研究路径的一个批评性评价,以期清华团队能修正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现有基础上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一、清华路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阎学通就一直站在提升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方

① 比如: Fung Yu-lan [冯友兰],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s. 1 - 2, trans. Derk Bodd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 1953); Kung-Chuan Hsiao [萧公权], *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On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Sixth Century A. D.*, trans. F. W. Mot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② Yan Xuetong, eds. by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trans. Edmund Ryde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法论领域的前沿。这一努力的成果包括一本广受欢迎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教科书和年度研究方法培训班。^① 他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贡献并不亚于他对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贡献,《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就是其方法论付诸实践的体现。在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他提倡偏向于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尽管他也承认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对假设检验、因果分析、客观性及可验证性的强调,^② 无疑表明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即是将此方法应用于对古代中国思想的分析。这一方法与此项研究背后的理论目标及政策动机的结合,意味着一种具有中国意识的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或取向的兴起。因其由阎学通和他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现已升级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同事们所首创,不妨称之为“清华路径”。不过,尽管这一路径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具原创性的研究前沿之一,它似乎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清华学派”。^③

清华路径有三个明显特征。首先,它的研究动机来自对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当前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的愿望。^④ 其次,它寻求分析借鉴中国先秦思想与实践的独到之处,以之为知识与思想来源。这是清华路径最具特色之处,也是中国意识充分展现之处。最后,如前述,它将阎学通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应用到对先秦思想的分析中。实际上,这已经涉及国际关系中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分支,不过阎著并没有参考这一领域的著作,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三个特征是否足以构成“清华学派”? 严谨而言,一个学派必须在一个领域具有独特且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标志性方法与观点,同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学术空间。例如,英国学派以

①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199.

③ 阎学通指出有一些中国学者已经使用“清华学派”来指谓他的研究, *Ibid.*, p. 255.

④ *Ibid.*, p. 200.

多元性方法和“国际社会”这一标志性观点闻名。^①哥本哈根学派通过借鉴语言行为理论发展出“安全化”的理论,并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揭示安全问题的社会构建。^②政治思想史中的剑桥学派则通过分析“语言”的含义与语境的独特方法,融合了政治史与思想史。^③不过,目前清华团队对古代中国思想、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及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方面,^④缺乏在方法和理论上的深入思考与论证。清华学派的建立尚需在理论、方法与经验研究上的诸多努力。

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本土化

如果将清华研究路径置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背景之中,它的意义在于它代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所谓本土化,是指中国学者不再完全依赖于从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学概念与理论,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借鉴中国自己的概念与思想来丰富现有理论或者发展新理论。在《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中,再也见不到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对西方理论的引介,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中国本土视角来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

这一点的意义或可通过简要评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史来更好地了解。

① 相关概述可见 Tim Dunne, “The English School,”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67 – 285; Richard Little, “The English Sc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3, 2000, pp. 395 – 422.

② 主要可见 Barry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8)。

③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J. G. A. Pocock,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除了《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外,相关著作还包括:阎学通、徐进主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另有《国际政治科学》上的多篇论文。

这一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为 1949—1963 年，当时中国并没有学术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所谓的“国际研究”主要以向政府提供内参与研究报告的形式而存在。公开的学术出版物几乎不存在，也几乎没有开展独立学术研究的可能性。1963—1978 年的第二阶段经历了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和国际上的中苏同盟破裂等重大事件。中苏关系紧张是中国政府决定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原因。这一阶段的意义在于它奠定了中国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的机制性基础：中国首次设立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准学术机构。但在研究方法、关注点和风格上，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几无差别，而且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变得更为意识形态化。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学科始于 1978—1990 年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相对专业性与独立性之所以可能，根本在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变化。中国学者开始史无前例地引进西方（主要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不过，在这一阶段的最后几年，他们也开始反思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成果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并开始考虑中国是否需要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1987 年，中国首个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讨论国际关系的中国理论，提出中国需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② 此后，中国是否需要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理论会有哪些特征及如何创造这些理论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一个主题。

1990—2000 年可视为第四个阶段，其特征是中国学者对社会科学理论自觉的进一步提升及对国际关系作为有别于政策建议与解读的独立学科

① 以下论述基于：Qin Yaqing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2007, pp. 313–340; 王逸舟《绪论》，载于王逸舟、袁正清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0 页；倪世雄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六十年》，载于杨洁勉主编《六十年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1—217 页。

② 石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的论证》，载于王逸舟、袁正清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第 522 页；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17 页。

的进一步认识。在这一阶段,从西方著作的翻译数量来说,中国学界对西方学术引进的趋势有增无减,在应用多种西方理论流派与视角的同时,也增强了学术批判性和独立性的意识。同时中国学界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开始进行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方法论争论相类似的讨论。^①这一阶段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国际关系中国理论的深入探讨。秦亚青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争论已经大致解决了中国是否需要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下一步应该是如何去创建这些理论的问题。^②

从2000年以来的第五个阶段已经过了12年。目前中国已经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既包括主流的“三大学派”,也包括一些非主流甚至边缘性的理论,如英国学派、女权主义与批判理论等。中国学界也开始了类似西方的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这一阶段颇引人注目的动向是“中国学派”说法的兴起。如果1978—1990年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前理论时期,1990—2000年是理论学习的开端,那么2000年之后则代表了理论学习的深入和理论构建的开端。^③

上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背景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清华路径的意义。中国学者提倡本土化,提出借鉴中国传统资源以发展中国理论,已非一朝一夕。但真正能把这些愿望付诸实践只能说是凤毛麟角。很多学者都提到中国传统资源的可借鉴性,但大多停留在对这些资源有用性的一种直觉认识上,难以真正知道应当如何去借鉴使用这些资源。即便是在几个极少数的例外中,如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对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研究,研究重点还是描述中国思想并将其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而不是发掘中国思想的理论潜力。^④此外,很少有学者能真正澄清本土化应如何展开或其

①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秦亚青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78—93页。

②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载于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

③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第306—343页; Qin Yaqing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313 – 340。

④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公司2003年版。

成果会是如何。正是在这一点上，清华路径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因此在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当然，这并不是说它是唯一有效的研究路径，只是说其学术上的严肃性和开拓性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清华路径与“中国学派”

此时不妨对关于“中国学派”的争论稍作评论。《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内附阎学通撰写的《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附录三)，强烈否定了“中国学派”的合理性。不过，它主要否定的是“中国学派”这一标签，而不是其具体的学术议程。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认同“中国学派”提倡者关于如何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在另一些方面则误解了“中国学派”提倡者的学术议程。因此，它对“中国学派”争论的解读对于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助益。从另一方面来说，该文使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争论的本质。“中国学派”的反对者和提倡者之间——至少阎学通和其主要批评对象秦亚青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阎著提出三条否定“中国学派”的理由。第一，国际关系理论通常不是由理论创立者自己命名的。第二，理论很少是以国家命名的，通常理论是根据其主要主张、主要创建者或其创立的学术机构而命名的。第三，“中国”的标签太过宽泛，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或流派能够代表中国历史和传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虽然这三点言之成理，但阎著主要纠结于“中国学派”这一标签是否合适这样一个语义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论证为什么“中国学派”提出的学术议程本身有问题。

阎著同时认为如果国际关系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么国际关系理论就必须是普遍适用的。中国学者在借鉴中国古代思想创建新理论上具有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而建立的理论就是中国理论。一个原因是，即便这些理论主要基于中国思想，它们也无法完全脱离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另一个原因是，优秀的理论必然借鉴所有重要的理论传统。因此，中国学者发展的理论也必将借鉴多种理论传统。他因此提出，中国学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理论的标签而是如何首先创造出理论。^①

隐含在这一批评中的，是阎著关于“中国学派”的目的是用中国理论去替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② 不过，这似乎并不是所有“中国学派”提倡者的假定。例如，“中国学派”说的核心代表人物秦亚青就认为，虽然中国学派来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与经验，但它最终将超越本土，具有普遍适用性。中国学派，据秦亚青的理解，是通过发掘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实践来创建同时具有中国本质与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它的目的不是替代现有理论，而是同时丰富现有理论和人类知识。^③ 也许秦亚青的这些观点是在吸收了对其早期“中国学派”论的批评（很可能也包括阎学通）之后有所修正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阎学通和秦亚青，作为这一争论对立方的核心代表，在两个根本点上是有共识的：第一，通过借鉴中国传统思想发展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研究是重要的；第二，这样一个研究议程的目的不是为了替代现有理论而是丰富它们。也许这两位学者在理论的本质、方法及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其他方面上仍有重大分歧（澄清这些分歧本身也会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贡献），但他们至少在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和途径的理解上有重要的共识。

“中国学派”的标签确实有误导性，“中国学派”的提出也似嫌过早。但鉴于阎、秦两人的共识，对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要的标签的批评应该让位于对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学术议程的探讨。确实，由于阎学通对先秦思想的研究，秦亚青已经把他归类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之中了。^④ 此外，国外学者很可能会把《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解读为中国学者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56.

② Ibid., p. 201.

③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第 306—343 页。亦见于 Yaqing Qin,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 Progress through Deb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1, No. 2, 2011, p. 250.

④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第 306—343 页。

提倡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例子。这两位学者之间的共识也预示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极可能且重要的方向：通过融合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西方理论继续推进本土化。

四、科学方法与古代中国思想

阎学通似乎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能毫无疑问地被应用于对先秦经典思想的分析中去。因此他没有——也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论证这一方法的可行性。他只在两处简单地论述到方法论问题。第一处是回应批评者关于先秦典籍的可靠性及古代经验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借鉴性的质疑。他认为古代典籍的可靠性与我们是否能借鉴它们并无关系，并认为古代中国历史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国际政治的有益案例。

第二处是在杨倩如评论一章（全书共收录了三篇此类的批评性文章）的一个引言中：

我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研究古代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现在，而不是理解过去。正是由于先秦诸子著作中所引用的事件之可靠性往往是无法确知的，因此我们研究时注重的是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事实本身。思想史研究中常常要求根据当时的历史场景去理解原文，这是必需的。但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我们无法关心也不关心原文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思想史学界就先秦著作的真实含义尚未达成共识，而我们也无法以不同含义的解释为前提进行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只能在共同标准和共同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相对科学的方法”就只能以字面含义为标准，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于字面含义的理解是没有分歧的。与其从一个凭借今人想象的，而又无把握绝对真实的历史场景去理解古人的语言，不如从抽象的人类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说两者都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历史真相，那么后者将更符合国

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因为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普世性的合理，而不是追求特殊性。^①

这一说明再次提到了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但认为既然先秦经典或其中记录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不确定，我们不应该关心经典原文的“真正含义”，而是应该关心它们的“字面含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古代思想背后的工具性动机——这一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古代思想本身，而是把它们当做一个思想资源库来满足当代理论和政策的需要。

这种思路在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极为常见，但同时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其工具性是对研究潜力的一种自我限制。使用经典思想来为当代理论提供哲学基础，为当代政策提供解释或合法性论证，以及为理论和政策讨论提供框架支持，是当代国际思想研究中的常见做法。^② 如果清华路径研究古代中国思想是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崛起的政策而服务，那也无可厚非，毕竟“理论总是为某个人与某种目的服务的”。^③ 不过，如果这种工具性太强，就无法认识到经典思想本身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有巨大潜力的领域，就可能忽视研究中国经典思想会对国际政治思想这一研究分支作出重大贡献。鉴于目前的国际政治思想领域尚未开始系统研究中国思想，^④ 我们更应该把它当做一项重要的学术议程来看待。这是一个一般性的评论，不是针对清华路径的具体批评。《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在很多方面都有创建，而且任何一项研究都有其局限性，因此强调它的工具性并不公平。但这个评论确实说明，清华路径只是研究古代中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p. 155 – 156.

② Beate Jahn, “Class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ntext,” in Beate Jahn ed., *Classic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

③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7.

④ 一个最近的尝试可见 Luke Glanville, “Retain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vereign Accountability in Ancient China,”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2, 2010, pp. 323 – 343.

国思想的一种思路，古代中国思想领域所蕴涵的学术潜力要比清华团队目前认识到的宽广很多。

不过，清华研究思路还有比工具性更深的方法问题。这一问题并不是现有批评中所提到的历史真实性或相关性。相反，它涉及另外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首先是基本但又极为棘手的如何通过经典文本研究古代思想的问题。阎著的答案似乎是：只要了解文本的字面含义而不是真实含义就可以了。这一认识背后的假定，是经典文本的字面含义是可知的，而它们的真实含义则难以确定。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会把方法论问题简化为看似简单地从字面上阅读文本的问题。真正的方法问题实际上因此而消失了，研究古代中国思想似乎不需要阎式科学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

不过，首先可以指出，“字面含义”与“真实含义”之间的区别相当模糊。“真实含义”具体何指？如果“字面含义”与“真实含义”之间有关系，这种关系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读懂“字面含义”也许并不足以理解经典中所蕴涵的思想；相反，它可能导致误解和误读。如果剑桥学派对研究国际政治思想有借鉴作用，^①那么这类研究必须同时考虑经典文本的含义与语境。也就是说，这类研究不仅需要揭示经典作者的主张或者观点，还必须揭示作者在其特定的历史、政治、学术及语义环境下提出其观点的目的与意义。^②研究古代中国思想需要科学方法之外的能满足其特殊研究需求的更优方法。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现代主义”，即用现代的假定去阅读经典而不是通过经典来开拓现代思维。^③这一问题在当前研究中极为普遍，表现在

① 剑桥学派特别是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著作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可见 Gerard Holden, “Who Contextualizes the Contextualizers? Disciplinary History and the Discourse about IR Discours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No. 2, 2002, pp. 253–270; Duncan S. A. Bel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Function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 Response to Emmanuel Nav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1, 2003, pp. 151–160。

②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 4.

③ Jahn, “Class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ntext,” pp. 3–4.

很多学者利用经典作者来阐述他们自己的主张，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将修昔底德说成是现实主义的鼻祖。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用预设的对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解来阅读经典，必然导致结论的片面性甚至荒谬性。^① 正如昆廷·斯金纳所言“在没有加入我们自己的主观期望和预判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研究经典作者观点的意义的（特别是在外来文化的情况下）。”^② 研究经典思想的一个危险之处，就在于研究者用预设的范式和熟悉的标准来研究经典文本。正确的方法，必须是从经典作者自己的情境中去理解他们。此外：

认为存在一套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的永恒的政治问题的想法是一种错误；相反，每个思想家关注的只是其自己的时代条件下存在的问题。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思想议程与我们的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相似性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相似性必须在具体情况下通过具体论证而得出。^③

例如，阎著应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古代中国思想，这显然是当代研究方法假定影响到古代思想研究的一个例子。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墨子和老子是体系分析论，管子和韩非子是国家分析论，孔子、孟子和荀子是个体分析论。^④ 这种分类当然可以做，也很有意思，但问题是它对古人思想的洞察力。“层次分析法”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历史上很多思想家，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没有对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或对体系、国家与个人的层次进行绝对的区分。阎著认识到

① Chris Brown, et al., “Introduction,” in Chris Brown,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olitical Thought: Texts from the Ancient Greek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4.

②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p. 58.

③ Brown, et al., “Introduction,” p. 4; See also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p. 88.

④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6.

先秦典籍也没有此类区分。^① 但通过应用“层次分析法”，它还是将先秦思想家分类到预设的方法论框架中，而不是通过先秦思想来反思当代方法论假定的局限性。这并不是说这种分类不可为，而是说它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它能得出颇具新意的结论，但不排除它也能同时遮盖中国思想中一些不为其所发现的独特之处。

另一当代方法论假定应用到先秦思想分析的例子是阎著对荀子的分析方法的评论：

荀子有关国际政治的认识虽然有较强的逻辑性，但按现代科学标准，其分析方法还算不上科学方法，他论证举例的方法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证方法。他所选用事例中很多都是历史传说，事件的时间、背景和基本过程都没有，事实来源无法查证。此外，他选用案例时缺少必要的变量控制，属于归纳法中的简单枚举法。简单枚举法是人们最经常使用的论证方法，但这种方法的科学性较差，案例的实证性和说服力都不太强。^②

正如徐进所指出的，这些评论对古人不免有些苛刻。^③ 实际上，用现代科学实证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先秦思想的“科学性”是颇可质疑乃至颇为奇怪的。以此为标准，则先秦先哲不免都难以及格。事实上，荀子的思想在先秦诸子思想中最具规律性，素以严谨性著称。^④ 当然，这种规律性和严谨性受限于早期中国思想的大环境，我们不应以现代科学标准衡量它，就像我们不会用两千年以后的科学标准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思维水平一样。这样做反而会阻碍我们去发现我们想要发现的古代思想的特殊性。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2.

② Ibid., p. 77.

③ Ibid., p. 165.

④ Frederick W. Mot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1), pp. 61 – 62.

将当代方法论假定应用于先秦思想的影响的第三个例子是政治实力是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基础的观点。^① 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分类是现代范畴，荀子或其他先秦诸子是否有此类划分颇可质疑，也许阎学通是把他自己对实力的理解强加到了荀子身上，从而使荀子的思想变得熟悉可辨。

下面通过讨论阎著对荀子思想的研究说明上述提出的第一个方法论问题。理解古代思想，不能只依赖于对文本字面含义的解读，还必须同时考虑到文本的真实含义与历史语境。这一问题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最明显的是，阎著经常将荀子在内政上的主张解读为他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显然是将荀子所论去语境化的表现。^②

例如，阎著写道，荀子认为人性恶是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③ 但是，荀子只是暗示人性是人类冲突的根源，且似乎是意指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政治。^④ 在讨论了荀子关于社会规范制约人性（似乎仍是在内政的框架下）的思想后，阎著转到了国际规范——“荀子关于用规范来防止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思想，与当代制度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⑤ 但是，荀子没有直接讨论过“用规范来防止国家间暴力冲突”（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同一问题也出现于以下论断——“荀子认为，没有社会等级来抑制人性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欲望，国际暴力冲突就不可避免。”^⑥ 但他引用的用来支持这一论断的荀子原文，实际上显示荀子意指国内社会：

分均则不偏，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⑦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78.

② 这里所说的“荀子”及人称代词“他”是指在历史上曾为《荀子》各篇言论贡献思想的古人，不必然局限于荀子一人本身。

③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92.

④ 荀子《性恶论》，载于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34—449页。

⑤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94.

⑥ Ibid., p. 95.

⑦ Ibid., p. 95.

或许可说，既然荀子没有区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那么我们可以把他的内政思想应用到国际政治上。在西方历史上，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也没有作出此类区分，而 20 世纪初期尼布尔和卡尔都把现实主义看作一般性的政治理论。^① 即便如此，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共通的假定必须得到明确，其可适用性也必须得到论证。这也表明，依赖荀子言论的字面含义是不够的，因为字面含义很容易就能被去语境化。

这一点可由阎著对荀子所描述的西周五服制的解读来进一步说明：

根据西周五服体系的历史经验，荀子认为依据关系的远近建立等级不同的国际规范是可以抑制国际暴力冲突的。他认为，周建立的五服体系之所以能维持西周时期国际体系的稳定，是因为这个体系是不同等级执行不同规范，所以这个规范系统才有效力。他说“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迹而等贡献，岂比齐哉！”这是说，帝王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方法，根据关系的远近来划分贡献的等级，怎么会都一样呢。^②

虽然有所差异的国家间规范可能有抑制国家间冲突的效用，但是这似乎并不是荀子使用五服制例子的本意。荀子是在反驳关于商汤和周武不能控制像楚、越这样的远国的观点。当他说“岂比齐哉”时，他是在提醒他的论争对手，周拥有对不同属国不同程度的控制，因此周确实既具有对近国也具有对远国——虽然不平等——的控制。正如该讨论的章节名所暗示的，荀子是在纠正对于他而言是对商汤和周武的统治权力的一种误解。^③ 比较可以断定的是，荀子不是在讨论国家间规范与国际体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阎著的解读因此不免有点断章取义之嫌。这并不是说他从这

①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sm,” in Reus-Smit and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34.

②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96.

③ 荀子《正论》，载于王先谦《荀子集解》第 18 章，第 321—345 页。

样的解读中得到的理论意义——国际政治中的等级规范——是不成立的。相反，这一论点极具启发性（见下文）。但是，结论的价值并不能掩盖方法的缺陷。

第二，阎著用科学方法解读荀子，因而忽视了荀子言论的意识形态性，更加忽视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言论是难以有效地用科学方法来解读的。虽然荀子在先秦诸子中是思想最严谨的，但恐怕还不是阎著解读下的“科学思想家”。阎著批评荀子不够“科学”，但科学性与否恐非荀子思想最重要之处。

就意识形态而言，荀子不是在知识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中提出其观点的，他所处的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动荡时期。毕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而“百家”争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主导地位，还包括政治上的追随者。作为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伟大儒家，荀子也有自己的学术与政治议题。他的观点有相当程度的意识形态性，盖因其也曾希望明君能采用他的说教与主张。这一意识形态动机必然导致论点的片面性与证据的选择性。如此则荀子言论的真义很难为阎式科学方法所揭示。与其说荀子是在寻找“普世真理”，倒不如说他是在推销自己的儒家治世之道。

荀子多篇言论充斥着这类意识形态的成分。当他强调王、霸、强的区别时，他是想说服明君采用王道。当他认为天下非暴力所能得时，^① 他是在建议君主行仁政，同时也有可能是在批评与其思想对立的像申不害和商鞅这样的法家。当他认为基于君主之德的王道是世界权力的顶峰，并引用商汤和周武用德治以小国而取天下的例子时，^② 他是在劝说君主发扬德治。正如阎著所认识到的，荀子所用的这些例子带有神话和传说的成分。但这正好说明了荀子言论的意识形态性。如此，则阎著由荀子启发而得的科学理论，至少在部分上是基于荀子的意识形态。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85.

② Ibid., pp. 86–87.

这一点也揭示出阎著下述论断的问题所在：

我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研究古代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现在，而不是理解过去。正是由于先秦诸子著作中所引用的事件之可靠性往往是无法确知的，因此我们研究时注重的是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事实本身。^①

实际上，我们确实需要关注事实，但并不是思想家们所使用的事实，而是严谨的历史研究所建立起来的史实。盖因此类史实的真实性固然还具有不确定性（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定性地建立起所谓的“真相”，不管是在历史、哲学甚或科学领域），它们却能帮助我们揭示古代思想意识形态的一面，从而防止我们把意识形态当做科学或逻辑思维。同时我们也只有通过对史实的了解——不管史实本身有多大的不确定性——才能理解经典思想的历史语境。因此，忽视古代中国思想中“事实”的一面是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思想的。^②

第三，从更深的层次上看，问题在于阎著几乎完全忽视了荀子思想的历史政治背景、意义与后果。正因研究荀子思想的目的是丰富现代理论并为中国崛起提供政策支持，这些背景与意义就更值得仔细反思了。阎著借鉴荀子的一处重点是荀子对社会阶层、规范和等级的讨论。对荀子而言，这些概念具有根本性意义，盖因如果人性如荀子所言是恶的，那么只有君主建立社会规范的等级，方能抑制人性恶的一面并引导其发挥善的一面。但这种可能性必须以具有强制力的君主和国家的存在为条件。荀子因此极力鼓吹并提升君主在其政治理论中的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155.

② 与这一论点相关的国际关系近著可见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地位。实际上,对荀子来说,君主几乎是所有社会生活的根本。^①与此相关的是国家作为政治与暴力机器在荀子思想中的地位,体现在荀子对强国之道的广泛讨论。

我们必须注意到,荀子的这一思想体系是以国内政治为背景出现的,需要强有力的君主来推行伦理标准和执行社会规范。荀子思想下的社会因此是“从上而下形成的,是君主的创造(荀子在这里并没有询问君主的权位如何存在或者君主是如何占据这一位置的),以便把人类从毁灭性冲突的自然状态中解救出来”。^②但是,和国内政治中的等级秩序规范相比,国际政治如何能有荀子式的能在国家间推行等级规范的君主?在荀子理想化的社会,社会规范最初是由圣王制定与推行的,而圣王所处的历史时代被假定为是一种原始状态,远古到无须解释的程度,^③但在国际政治中此类圣王存在的可能性又有多少?阎著没有考虑如何将荀子认为是在等级制的国内社会中发展出来的社会规范应用到缺乏建立等级规范条件(比如一个强力的君主或中央政府)的国际政治中去的问题。也就是说,因为对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状态的忽视,阎学通此时更像是一个儒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这并不是说国际政治中的社会规范是不存在的,也不是说荀子的思想不能被用于国际政治——国际规范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荀子的思想对国际政治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这确实意味着,应用荀子思想不能只依赖于荀子言论的字面含义,还必须考虑到其观点的历史情境。

荀子思想另一极为重要且为历代史家所重视的特点在于,荀子对君主和国家的美化,以及对社会等级的管理和社会规范的执行,当被推到极端

① Hsiao, *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pp. 190 – 191; Mot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 p. 62.

② David Shepherd Nivison, “Th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Writings,”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45 – 812, at p. 794.

③ 荀子《礼论》,上引《荀子集解》,第346—378页;也可参见Nivison, “Th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Writings,” p. 797.

时，可在逻辑上引导出君主专制政府的理论。^① 历史上，这样的理论首先是由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和李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代表——创立的，其后以不同的形式为中华帝国统治者所采用。当然，我们不能将法家的成功归因于荀子（荀子绝对是儒家成分大于法家），就像我们不能把希特勒在西方的出现归因于柏拉图一样。^②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荀子思想中的理论缺陷、伦理问题及历史后果，特别是在将其用于当代目的之时。每一个理论——不管是古代中国思想还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其伦理性和规范性的一面。^③ 如果不对荀子思想的这些方面作出澄清，阎著很容易被外界误读为鼓吹为中国未来霸权服务的一种后帝国时代等级国际政治的模式，就像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论被误读为在 21 世纪复活帝国治理模式的企图一样。^④

五、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理论主张。不过，它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以先秦思想为基础创建了新的理论，而在于提出了新理论的一些基础性要素而为未来进一步构建打下基础。该书承认系统性的理论尚未建立，^⑤ 并提出以在先秦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未来的任务。^⑥ 清华学派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本书提示的理论潜力能否得到具体实现。这并不是对该

① Hsiao, *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pp. 205 – 206; Wang Gungwu,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73.

② Mot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 p. 63.

③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Between Utopia and Reality: The Practical Discours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 – 37.

④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2008, pp. 749 – 761.

⑤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199.

⑥ Ibid., p. 221.

书的批评，每一本书所能取得的成就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开拓性的研究而言。

阎著概括了四大理论意义，包括实力的等级结构、等级规范的功能、规范的內化及政治实力的根本重要性。^① 在国际等级上，阎著认为：

先秦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权力都是等级结构，这一点显然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不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普遍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结构，即行为体功能相同，权力关系平等；而国内体系是等级结构，行为体功能各异，权力体现为上下级关系。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今天的国际体系，我们会发现，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的内部权力关系其实也都是等级结构而非平等结构……如果我们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权力平等的概念与先秦时期的等级权力概念相结合，我们会得出一些新的设想。例如，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关系既非上下级关系，也非平等关系，而是松散的等级关系；国内体系的权力关系由社会规范决定，而国际体系权力关系由国家能力决定；在国内体系内，等级规范主导社会行为，而在国际体系内，等级规范与平等规范共同主导国家行为。^②

这似乎是在通过建议修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假定而提出一种国际等级理论。不过，等级的概念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引文的首句似乎暗示权力的等级，但是其后关于国际组织内部权力结构的例子似乎指向一种排名或地位上的等级。在此，“在国际体系内，等级规范与平等规范共同主导国家行为”的提示极有意义，但需要完整的理论论证。

国际政治中的等级状态正日益成为一个显赫的研究领域，但清华团队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p. 212 – 213.

② Ibid., pp. 212 – 213.

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领域的文献。^① 阎著认为 “先秦思想家们对于国家权力和国际权威的区分，使我们意识到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缺少对权力和权威的区分，更缺少对权威问题的研究。”^② 这个判断在 2005 年清华团队开始研究先秦思想时就已难说公允，现在鉴于国际上对等级制和国际权威研究的迅速展开，更是难以成立了。^③ 清华团队若想获得更大的国际认可，必须借鉴最新的国际研究成果并与之展开对话，同时完善自己理论的逻辑，使这些理论能和现有理论进行比较，从而澄清清华路径的真正贡献。

同时，阎著似乎也提出了一种国际政治中的等级规范的理论：

先秦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以等级规范约束国家行为可以维持国家间的秩序，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则认为，以平等规范约束国家行为才能维护国际体系的秩序。观察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绝对平等关系导致绝对的暴力冲突，绝对的等级关系导致绝对的以强压弱暴政。如果我们将两种思想认识相结合，则可以假设平等规范与等级规

① 可参见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William C. 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28 – 57; David C. Kang,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4, 2010, pp. 591 – 622; and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7 – 85.

②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64.

③ 可参见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Polity, 2002); Miles Kahler and David A. Lak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 Economy: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ransi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vid A. Lake, “Rightful Rules: Authority, Ord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3, 2010, pp. 587 – 613; Katja Weber, *Hierarchy Amidst Anarchy: Transaction Costs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Alexander Cooley and Hendrik Spruyt, *Contracting States: Sovereignty Transf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Ia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2, 1999, pp. 379 – 408; Bruce Cronin and Ian Hurd, eds.,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范相结合,是最有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①

这是对国际政治极有洞见力的观察,“平等规范与等级规范相结合最有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假设也极为重要。问题当然是,这种结合如何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如何在实践上找到佐证或可能性。等级规范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能为不同的国际行为体所接受?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国际政治中等级规范的产生和内化的理论。此外,这方面的讨论也可涉及国际正义的重要问题,而阎著基本上忽略了这一问题。

阎著第三大理论主张,是政治实力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基础及霸权的根基:

政治实力转化为军事和经济硬实力的增强是获取国际主导权的基础。也就是说,霸权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而硬实力又是以政治实力为基础。政治实力的基础越宽厚,所能转化出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越强大。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种霸权、硬实力、政治实力这样一个三级金字塔式的霸权理论框架。^②

虽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含义较为直接,政治实力的含义却不那么明了。阎著有时将政治实力等同于国家政策的结果,有时却又将其视作“政治操纵力”。^③ 在另一篇文章中,政治权力被认为是“国家动员力”,包括国内动员和国际动员的能力。^④ 那么,此类动员能力的要素是什么?它们如何变化?如何去衡量?实力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而清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13.

② Ibid., p. 215.

③ Ibid., p. 138.

④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Power Statu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 21.

华团队似乎也没有深入借鉴这方面的文献。^①在这点上，清华团队也需在借鉴先秦思想、阎学通自己对实力的研究及国际上最新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国际关系中实力的完整理论，包括实力的来源、成分和效果，特别是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此处可指出的是，政治实力的概念可能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概念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是由实力要素（物质力量的资源）定义的，这也是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对实力的理解。但是，政治实力似乎并非由此类实力要素定义而来——如果确由资源要素定义，那么这些要素所指为何？政治学文献中有关实力的“四个面相”之说，^②政治权力属于其中的哪个面相？在当前理解实力的各种不同理论中（包括现实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等），阎著采取的又是哪种理论视角？如果阎著对实力的理解与当前各文献都不同，那么这种理解的理论根基又是什么？

阎著也提出了一种霸权理论，认为霸权国的性质可能决定国际体系稳定性的程度：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稳定论忽视了霸权性质与国际秩序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先秦思想家们不但提出与霸权相对的王权概念，而且区分了两者的核心差别是道义的有无。根据他们的思想，我们可以假设霸权的道义水平高低关系到国际体系稳定性的高低和持续性的长短。^③

如果这一逻辑可信——霸权国的道义水平而不是其物质实力决定国际体系稳定性——随之而来的理论问题就变成如何界定国家的道义水平及如

① 概论性研究可参见 Janice Bially Mattern, “The Concept of Power and the (Un)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us-Smit and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91–698; David A. Baldwi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177–191.

② 参见 Mattern, “The Concept of Power”。

③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p. 64–65.

何理解其来源、变化与效果。虽然现有文献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权威有所讨论,^①但其道德权威所指似乎并不是国家的道义。从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讨论国家的道义?其最终所指是否需回到统治者的品质、国家的政策还是其他因素?像“国际王权”或“国际仁义权威”^②这样的概念应如何界定?另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古代中国思想对国家性质的强调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原因?西方思想如当代现实主义很少考虑国家性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因此追问中国思想对国家性质关注的原因所在似乎也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上述指出的四大理论潜力若想成为实际影响,则清华团队不仅需要阐明这些理论的逻辑结构,还需以严谨深入的经验研究进行论证,其中不免涉及上述的方法论问题。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专著:传统研究专著通过严谨的研究设计来解决一个特定的研究问题,而该书主要是一本有明确主题的论文集,缺少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和为之服务的研究设计。这样的结构是由清华团队的研究方式决定的——主要是阎学通牵头下的课题制形式。不同的学者研究不同的思想家,最后由阎学通综合他们的研究成果,达成一个较连贯的结论。不过,清华研究路径若想继续深入,有必要在研究设计上转向专著的思路,通过一整套严谨的理论构建、方法程序及经验论证解决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评价阎著,会发现它除了提出上述的解释性理论外,还涉及建议如何作为的规范性理论。例如,阎著认为国际规范可有助于促进国际体系稳定,因此它强烈建议国际社会建立此类规范,并分别以中国—东盟合作和日本—东盟关系为正反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③不过,规范性理论最好的体现,是其对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的看法:

① Rodney Bruce Hall, "Moral Authority as a Power Resour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1997, pp. 591 - 622.

②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65.

③ Ibid., p. 105.

从世界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思考如何才能使中国崛起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国际规范的进步。根据先秦思想，中国崛起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战略目标，即建立王权还是建立霸权。前者将是一种相对和谐的国际体系，后者则是一种常见的国际体系。同样，世界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也有两种选择，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还是重复美国霸权式的秩序。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不仅要改变国际实力格局还得改变国际规范。^①

阎著的理论因此是解释性与规范性并存的。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很大程度上由于研究先秦思想的原因，阎学通已经成为一个“道义现实主义者”。“道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也许在西方不太可能，但在中国学术和思想史的大背景下则并不是太令人惊讶。阎学通保留了现实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主张——硬实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但他对政治实力而不是经济或军事实力的强调，对等级状态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强调，以及对国际规范、国家道义、政治思想以及王权等概念的强调，已脱离了西方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范畴。不过，如果考虑到荀子和其他先秦思想的影响，他的新“道义转向”就显得很自然；而因他认为中国崛起需要更强大的实力，所以他对现实主义中硬实力重要性的持续信仰也能得到解释。因此，我们看到，中国道义论和西方现实主义这两种独立的、不相关的知识传统，在当今中国竟汇合且促成了一种道义现实主义。这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中知识的社会学的一个极有意思的案例。

从具体学术意义上说，道义现实主义非但不是现实主义理论“硬核”上的“退化”，而且可能为现实主义提供一个在规范性上更合理的理论方向。卡尔早就提到，单纯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无法支撑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作为政治学，必须在其政治思想与实践的体系中同时具有“乌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04.

托邦与现实、道义与权力”。^①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道义论与现实主义对实力理解的融合，有可能创造出不俗的理论潜力。历史上，儒家主要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哲学，且一度为法家在中国帝制时代之初所颠覆。虽然儒学后来成为帝国意识形态，但帝国的实际运行靠的是儒家理想与法家实践的结合，即所谓的“外儒内法”。儒家所缺乏的是对权力政治的理解。现代现实主义所缺乏的，则是对其伦理困境的认识。道义现实主义因此有潜力融合这两个思想传统的优点并弥补其缺陷。

从这个意义上讲，阎学通与西方古典现实主义者的相似之处要多于他与新现实主义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古典现实主义者认识到规范与伦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而新现实主义者则在寻找国际政治“科学”的过程中放弃了对规范和道义的思考。^②阎学通也许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他认定自己是在“科学地”研究国际政治。不过，事实上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理论既是解释性的也是规范性的。而且现在他理论中理想主义的部分（即儒家道义论）而不是现实主义的部分（即硬实力核心论）才是最具特色之处。儒家规范性思想的一面有望弥补现有现实主义理论的伦理不足。

道义现实主义在伦理上比当代现实主义要开放得多，不过它也有自己的问题。当代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自我主义及群体主义的强调，使其宣扬国家应该采取一种在非道德的权力政治中保持审慎的政策。这一立场经常导致一种置国际正义于不顾的扭曲的外交政策。^③道义现实主义强调等级、规范与道义，因此对国际政治的稳定和正义有更多的思考。另一方面，道义现实主义也有被误用和滥用的危险。道义现实主义的最佳状态，是促成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在伦理上的互补，以便使权力能有道义基础，使理想能有现实基础。但是，它也

①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 - 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46) .

②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③ Jack Donnelly, "The Ethics of Realism," in Reus-Smit and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59.

可能制造出一种危险的在道义光环点缀下的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是道义现实主义必须面对的伦理困境。此外，阎式道义现实主义还包括一种毫不掩饰的国家主义和大国主义，甚至是一种中国式的霸权主义，特别是当其主张（有时是假定）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的时候。这并不是对阎著做道德评判，而是指出其理论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特征。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清华研究路径也需要一个批判性的维度。批判性理论的目的是批评社会状况，说明其如何得以存在，并指出如何使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① 批判性理论与清华团队对先秦思想的研究是相关的，因为阎著多次暗示当前国际政治的不公正之处，并指出先秦思想能为解决这些不公正之处提供思路。更重要的是，阎著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是指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和政策的内在问题，并提出政治改革和政策变化的重要问题。毕竟，阎学通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官方政策最直接最深刻的批评者之一。清华路径的批判性理论的潜力因此是巨大的。一个理论可以同时具备解释性、规范性和批判性。一个优秀的理论应该尝试解释政治现实，批评现有政治，并指出未来改进的方向。

六、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崛起

阎著的道义现实主义不仅有理论潜力，也有政策意义。首先，它提出了一系列极富挑战性的政策建议，是对现有政策的巨大冲击。其次，它预示着中国国际关系和战略学界一种新的战略言论的兴起，并可能影响中国知识界未来对国际战略的讨论。例如，它将王、霸、强、战略可靠性等新概念融合在一个整体的学术框架之中，不仅用来分析先秦思想，也用来讨论当下中国的对外战略。当然，阎学通的政策“激进”为时已久，先秦

^① Milja Kurki and Colin Wigh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cience,” in Tim Dune,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8.

思想对其政策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中国历史和当代理论底蕴的学术根基。虽然这一新的政策言论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人接受尚待观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研究为思考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来源和学术激励。

阎著的政策建议围绕中国“如何做世界主导国和做什么样的世界主导国”而展开。^① 如果放在10年之前,这无疑是极为激进的问题,即便在今天,也不乏有人批评其不切实际,盖其主旨是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则的直接挑战。中国的世界主导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讨论的禁区,重提这个问题(新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提到世界领导权还是毛泽东“革命外交”时期,阎著所指的似乎是中华帝国时期)^② 代表了中国国际战略思维的重大变化。阎学通是最早认识到中国需要积极外交政策的学者之一,这一政策取向在此书中有增无减。

阎学通的政策建议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在大战略的层次上,他建议中国将以古代中国王道思想为基础的世界霸权作为外交政策目标,并与美国的“虚伪的霸权”区别开来。^③ 他认为,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需要中国成为比美国更负责任的国家,需要提供一种比美国模式更佳的社会发展模式。^④ 他同时认为,中国需要向外界提供“普世性的观念”而不是“中国特色”。^⑤ 这是在建议一种以普世性为基础的道义霸权,而这种大战略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先例。现有的官方更多的是坚持“韬光养晦”而不是进行大战略变革。阎著的重要性在于显示了——不管官方立场如何——霸权或者王权绝对是中国知识界讨论的中国大战略选择之一。

道义现实主义对中国大战略的建议是世界主导权,这就像进攻性现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16.

② Ibid., p. 218.

③ Ibid., pp. 218, 219.

④ Ibid., pp. 65 – 66, p. 99.

⑤ Ibid., p. 62.

实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建议是遏制中国一样，^①体现了其理论逻辑的极不寻常之处。不过，这并不是说阎论就像是在为一些美国现实主义者对中国霸权雄心的怀疑提供完美的佐证。^②阎著“中国霸权论”背后的核心逻辑并不是现实主义。它更是一个基于道义文化的政策理论而不是物质主义的现实主义论，盖因其对中国霸权的宣扬几乎完全源于古代王霸思想的吸引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古代思想无疑可以作为当代政策思考的借鉴，这些思想的使用却需要考虑不同的历史背景，生搬硬套只会造成思想混乱与不必要的误解。如果中华帝国可资当代中国借鉴，我们尚需研究这两个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国际处境的异同之处，如此方知古代中国的世界主导权战略是否适合当代中国。^③阎著假定国际政治就是霸权的更替，而中国就是替代美国的下一任世界霸权国。不过，即便如此，未来的中国霸权恐怕会与过去的中国霸权大不相同，毕竟两者的历史背景已经有了巨变。中国霸权论若想有更大的可信度，尚需在理论和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修正与深化。

尽管存在这个问题，可以指出的是，阎著对道义和政治实力——而不是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强调，是对当下中国战略学界存在的一种原始粗糙的地缘政治论的有力消解。^④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路径的出现颇为可喜，因为它提出了一种新的而且看似人性化的战略言论，可促使中国战略讨论朝着一种健康的方向发展。当然，阎学通承认自己也是个民族主义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

② 近例可见 Aaron L. Friedberg, “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14, July–August 201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hegemony-chinese-characteristics-5439>, accessed July 27, 2011, 其中引用阎学通为“保守派学者”。

③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18。至于古代中国的大战略是否为世界主导权，这是一个尚需仔细研究的问题。不同于对先秦思想的研究，清华团队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似乎尚未展开。

④ 参见 Christopher Hughes, “Reclassify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opolitik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0, No. 71, 2011, pp. 601–620。

者。^①但他的“新传统民族主义”来源于对中国传统重建的尝试，与源自现代西方的“地缘政治民族主义”格格不入。这也体现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来源的多样性。只要中国存在基本的学术和政策讨论的空间，我们就不必太担心某一种民族主义的思想霸权。

其次，在对外政策和国家实力的层次上，阎著认为：

借鉴先秦有关王霸性质区别的认识，中国崛起战略的对外政策需从三方面区别于美国。首先，推行责任与权力相一致的国际秩序原则……二是推行反向双重标准原则，即越发达的国家要执行比越落后的国家更为严格的国际准则……三是推行东方传统的天下为一的开放原则，即中国对全世界开放，世界各国对中国开放。^②

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具开放性、更负责任的大国。阎著对“天下”这个传统概念的借用，不得不使人思考是否“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包括阎学通这位国际关系学者和赵汀阳这位哲学家——在思考中国的世界地位时必不可少的概念。阎著同时认为，中国需要发展其政治实力（至少是战略可靠性），^③并实现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均衡发展。^④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批评。鉴于过去30年来经济发展在国家政策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批评对现行政策的冲击性丝毫不亚于其他建议。

再次，在具体的战略层次上，阎著也提出了对中国崛起战略的建议。例如，它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战略创新，而放弃长期以来的不结盟战略，采取结盟战略以扩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可是新历史条件下战略创新的一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45.

② Ibid., pp. 219 – 220.

③ Ibid., pp. 102, 217.

④ Ibid., p. 142.

个体现。^①这也是对现有政策的挑战。虽然事实上不算是激进——毕竟中国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和美国都有过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盟——新的结盟战略将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旨。不过，结盟这一政策建议是否是道义现实主义的忠实体现，是个可商榷的问题，盖因中国现有外交道义的一部分来源是其不结盟原则，因为这体现了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不同之处，而重建联盟则将使中国丧失这一道义优势。

最后，阎著一个极为重要但也从未挑明的政策意义，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需要。它提出，中国需要发展能吸引国际人才的大国人才战略，需要进行制度创新，需要推广民主的道义原则，^②并认为“不能正视历史事实的民族是不可能使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③这些建议会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没有一项是可以在没有国内改革的情况下得到实施的。阎著对正视历史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那么现代中国有没有正视历史事实而使其他国家心悦诚服了？这一点的提出，即证明正视历史事实在中国是一个问题。最终，阎式道义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关于内政的理论：除非中国对内进行政治改革并首先在国内实行“王道”，否则不可能赢得对外的国际“王道”之治。

七、结论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代表着国际关系领域清华研究路径的兴起。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种最新的开拓性研究思路，它有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理论问题尚待解决。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本土化的最新也是目前为止最深刻的代表作，该书会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作为中国学界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一项创新性贡献，它具有不俗

①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143.

② Ibid., pp. 67 – 68, 103, 219.

③ Ibid., p. 218.

的理论潜力和政策意义。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它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开始了对中国国际关系传统的知识重建，并为中国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开辟了一个方向。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它的重要性在于使“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①这一问题显得有点过时。虽然清华路径尚需多方面努力以获得学界的认可，但它无疑提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雏形与框架。

^①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0); 相关讨论也可参见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1, No. 2, 2011。

作者简介

刁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1 年、2007 年和 2010 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分别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2012 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电子信箱: diaodaming@ gmail. com

陈 冲 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10 年和 2012 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nkchenchong@ gmail. com

王广涛 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2012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9 年在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wangguang33@ 163. com

曾向红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2010 年在兰州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lzdxyzjys@ yahoo. cn

陈一一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2012 年 7 月在兰州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cyyor@ 126. com

张 锋 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电子信箱: fengzhangmc@ gmail. com